

策论·关注“县中振兴”系列评论之一

完善治理方略激发县中办学新活力

陈武林

近来,有关县中发展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县中是县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典型代表,是全县学子心驰神往的求知殿堂,更是全县老百姓心目中深受认可的优质学校。县中固然是一县教育质量的试金石,但其办学质量的高低也离不开全县义务教育的基本支撑。某种程度上,能否办好县中反映着该县教育的发展水平。

城镇化重塑了县中的发展空间。原先的县中在相对封闭的管理系统中,属于优质教育资源,并负有向周边学校辐射资源的责任。尽管县中地位重要,但“县中塌陷”的症状也不可忽视,特别是优质师生流失,教育质量下降,更是让社会对县中的教育信心出现明显的波动。与城市相比,由于处于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县中在教育质量表上处于不利地位。县域内一部分的优质生源和师资力量主动选择进入省城或者地市的学校。如此一来,一些“超级中学”凭借雄厚财

编者按:县中振兴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县中的发展重心和破局之策在哪里?如何将县中振兴与基础教育整体改革结合起来?如何全面提升县中的办学水平,实现县域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从今天开始,我们刊发系列文章进行探讨,以期激发县中振兴的新思路。

力、优越办学条件,快速吸引优质生源和教师集聚,导致县中在发展上失去了传统优势,特别是一些拥有较长历史的县中,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先机,其办学活力也在地方教育发展格局中慢慢消解。

在教育功能的社会筛选机制中,人们对高学历、名校、升学率有着超高的期待,这种功利性导向给教育生态平衡带来严重冲击。事实上,县域教育生源质量和校外培训负担加重仍然对冲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县中的生源大部分来自城镇或农村,现如今这些家长普遍重视子女升学情况,教育方式也从传统的“放任自流”向“精心栽培”转变,因而他们的教育焦虑同样不

可避免。在社会资源重组的过程中,县中不再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中,除了县域的人口流失、资源流失给县中生源和师资带来一定的冲击之外,学校内部治理未能有效跟进外部变化而导致发展受限更是影响县中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些县中的学校管理水平不足,存在教育投入重硬软件、轻软软件的现象。再加上有些县中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不够完善,尤其是个别学校惯于采用科层式管理模式管理教师队伍,很不利于激发教师内在的潜能和激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县中的教学质量。

做好“双减”工作,对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构建良好教育生态至关重要。虽然学校治理受制于社会环境,城镇化导致的新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但当学校治理日臻完善时,县中教育质量也会得到广泛认可,必能为学生成长提供可靠的选择。因此,县中作为县域整体教育发展质量标识,其治理应对也应标本兼治,通过克服那些压制或阻碍办学活力的因素,探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这也是在落实“双减”政策要求上作出实绩的重要体现。

政府应该明确限定县中的公共服务边界,合理规范招生区域范围及入学标准。在规范县中服务边界基础上调整区域财政供给体系,缩小不同地区校长、教师的收入差距,保证市内教师工资待遇大体相当。县中在人才物等资源需求上固然需要政府的基本保障,但对县中办学成效还需要从增值性、发展性的角度加强督导,让那些办学业绩突出、努力探索创新的学校获得教育行政部门的更多鼓励。如此才能有效激发学校领导者的办学热情和责任意识,从而为县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激发县中的办学活力还需要学校管理者审时度势理解学校所处的内外环境,从师生发展的立场出发,改善学校治理格局,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改善学校治理格局,主要是参与学校治理的力量调整,即不再单纯以学校科层化的行政管理为核心,而是致力于建立学校利益相关者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推动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育人。同时,学校办学行为应始终围绕学生发展这个基点运行,为学生提供符合他们年龄特点和教学规律的学习条件,使办学质量达到预期目标。

作者系深圳大学副教授

一家之言

完善预警机制 防范师德失范

陈亚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明确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师德师风建设的规范性文件,对各级各类学校师德师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指导意见,但师德失范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对教师整体形象和教育行业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同时也必须正确认识师德师风建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在实践中不难发现,大多数师德失范行为并非突发,而是有一个长期积累到最终爆发的过程。针对这一特征,亟须结合师德师风建设规律和师德建设规律,在高校探索建设师德失范预警机制,建立涵盖师德宣传、教育、监督、考核、奖惩、保障等方面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在高校建立师德失范预警机制就是通过压实学校各级各方面在师德师风建设上的责任,明确工作职责,当出现师德失范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时,相关工作主体能及时掌握师德师风动态并予以帮助提醒。具体来讲,预警主体包括学校党委、职能部门、教学单位、教师党支部、教师本人等层级;预警内容覆盖教师教学、科研、生活等方面;进而形成覆盖教师全员、教师发展全过程、校园生活全方位的师德失范预警体系。

各高校党委要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成立教师工作委员会,全面领导本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负责师德师风预警的体制机制建设,对标对表上级要求并结合高校实际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师德失范预警工作机制顺畅、有章可循。

高校各职能部门负责业务领域内的预警,形成预警矩阵。具体来说,教务部门要通过学生评教等途径负责“评教预警”,教学督导部门通过课堂教学管理负责“督导预警”,科研部门负责教师科学研究行为的“学术道德规范预警”,宣传部门负责基于社会关注的“舆论预警”,学生工作部门发挥紧密联系学生优势负责“学生预警”,学院落实“日常预警”,成立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小组,定期研判本单位师德师风建设态势,开展针对性师德警示教育,把好师德考核关,对师德不合格的,坚决实施“一票否决”。教师党支部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优势,通过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等方式,做好教师“身边的预警”。通过对教师加强法律法规教育,选树教书育人先进典型,引导教师个人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实现师德建设的自我认同,做好“自己的预警人”。

新形势下,在高校建立师德失范预警机制可以有力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一是绷紧在前,师德失范预警机制可以推动师德失范监管关口前移,重教育提醒,能最大可能避免发生严重师德失范事件。二是体系为要,以建立师德失范预警机制为抓手,强化主体责任,明确校内各部门师德师风建设职责,上下一体,形成师德师风建设合力。三是有的放矢,聚焦师德师风重点问题、关键环节,化被动为主动,变应付性惩处为针对性帮扶,做到超前反馈,有助于全面提升师德建设水平。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漫话

“暴力教育”要不得

近日,江苏新闻报道了一起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件。武汉的周先生发现儿子边写作业边玩手机,一怒之下挥拳“教训”。结果儿子没有受伤,周先生反而因为打到了儿子用来抵挡的手肘,被送进医院,确诊为“拳击手骨折”。

家长在教育孩子时“误伤”了自己,可见用力之大。不管怎样,用暴力手段教育子女,不仅不利于少年儿童的生长进步,还会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伤害,更不符合法律要求与道德规范。家长要避免“不打不成才”的传统理念,而应以身作则、循循善诱,不能操之过急,一言不合就动用武力,不然只会害了孩子也伤了自己。

教指委专家谈“双减”

优化作业设计 增强育人实效

罗生全

作为课程与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业是学生在课堂教学时间之外完成的一种自主性、探究性、有意义的智力或技能活动,对于学生建构生活意义、增进学习体验、提升学习效能具有积极作用。作业设计是作业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前提保障,高质量的作业设计是有效发挥作业育人实效的关键所在。

从本质上讲,作业设计的核心价值,在于强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培育学生的知识迁移和综合运用能力。这就要求,作业设计要以学生的自由健康发展为根本目的,通过设计贴近实际、层次丰富的作业形式,帮助学生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走向生活、走向实践,在真实而充盈的体验中幸福生活、快乐

成长。有鉴于此,作业设计需要从枯燥的形式训练转向个性表达与思维创造,从定向布置转向梯度设置与按需选择,从对作业难度与数量的盲目追求转向促进儿童真实且完整生命发展的育人本质。

在此思维指引之下,我们将作业设计划分为三层价值维度。第一层是基于知识发展逻辑的作业设计。传播知识是教育的核心内容,这就要求作业设计应在尊重学生身心认知发展规律基础之上,以知识发展逻辑为轴心,跨学科、分层次地从“教—学—练—评”一体化的设计思路,实现课堂与课后知识的双向融通和系统整合。第二层是基于学生综合素质的作业设计。以学生掌握的系统知识为基础,通过创设情境将知识记忆转换为基于个体

素养、态度、价值观的塑造。第三层是基于现实问题解决的作业设计。围绕知识发展逻辑,从学习知识、理解知识、运用知识、产生新知识的思维脉络,构建任务驱动的意义学习,使作业不仅成为巩固知识、生成知识运用、生成与创造的重要途径。

优化作业设计的本质,在于从质与量的关系转变上寻求作业设计困境的有效突破,重塑作业的育人价值,增强作业的育人实效。因此,基于作业设计的三层价值维度,我们将作业设计划分为知识型作业设计、能力型作业设计和实践型作业设计,通过对学生学习需求和作业设计规律的系统整合,建构系统性、有效性和适切性的差异化、层次性的作业设计体系,进而为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减轻学生过重作业

负担提供新的思考路径。知识型作业设计强调学生对课堂教学知识的加深与巩固,是“转识成智”的中介桥梁。知识型作业设计需要教师以学情为逻辑根基,以大单元设计为根本思路,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特点,提供重点分层的多样态知识型作业,让学生在阅读、抄写、记诵、自主查询、疑问、感悟等活动中渐进式生成对学习内容

的深化认知。能力型作业设计强调师生通过相互协作、共同参与,以问题解决的深度学习促进学生良好学习品质的形成。能力型作业设计需要教师积极创设问题情境,协助学生找到符合自己特性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小组合作或独立任务的形式,引导学生提出假设、查阅

文献、收集资料、制定方案、实施方案、呈现研究结果等,实现学生作业过程中的素养培育。实践型作业设计是一种沉浸式的学习行为活动设计,对于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运用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大有裨益。实践型作业设计需要教师根据学生学习基础和可利用资源,精选设计与学生生活实际情境和学生学力相匹配的实践活动,以接轨学生个体差异和生活认知,提升实践型作业的适配性。与此同时,教师要根据不同学科、学段要求,设计丰富多样

的探究性作业类型,以期通过多重体验、训练与操作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作者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指导委员会综合实践活动专委会委员、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

“减负提质”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烈

作为育人主体的学校,将“双减”理念及要求转化为学校教育实践的探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人的发展规律来看,小学阶段的孩子最重要的是身心健康成长,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运动尤为重要;从教育规律来看,小学教育具有突出的基础性,“五育”并举方为正本。“双减”的目的不是简单减少课内外的作业或学习时间,更不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去减轻负担。负担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体验。客观上讲,有学习任务就会有负担,但所感受到的负担程度又是一种主观体验,感到负担超越自身承受的“阈值”时就是“过重负担”,而不同的志趣追求、学习能力、心理感受等方面是不

同的,因此这种主观体验也有个体差异。可见,做到“减负提质”,不仅要学业负担的客观指标降下来,更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他们从“学业负担的被动承担者”成为“减负行动的主动参与者”,真正把学习活动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比如,在作业研究上,打破师生关系中教师的绝对权威,开展学生自主作业的探索行动。启发、培养学生的自我认识与判断,将作业的选择权交给学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训练。同时,教师给予方法指导与差异化建议,给予必要的学习效果检查,从而不断提高作业的针对性、有效性,以及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自主学习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倡导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本课

堂,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勇敢地退”,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空间去实践、思考、交流,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真问题、真过程、真感悟。同时,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能力的掌握,也要关注学生是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从而激发他们内心的热爱与内在的动机,发展自主性、能动性

和创造性。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提高单位时间内学生自身的学习质量,却无法解决学校目前面临的内容多与时间少之间的矛盾。现行的学习内容没有减少,学习要求没有降低,这就需要学校在课程实施上“先做减法,再做加法”。减掉有应试倾向、重复性训练的内容,增加课程及内容上的整合与融合。比如,倡导各学科基于自身特点和学科核心素养开展大概念下的单元教

学设计,鼓励多种形式的跨学科融合等。再比如,将劳动融入学生的生活、班级的服务岗以及其他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形成“实践、服务、体验”三位一体的融合性劳动教育课程,在多形式的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劳动态度、习惯与技能。

在学校工作的变革中,教师的改变非常重要。没有教师的接纳、认可和主动探索,再美好的概念、想法都只能是无法落地的空中楼阁。因此,推动“双减”政策的落实,还需关注教师的改变。教师的改变,关键在自身发展内在动力的唤醒。“减负提质”先要解放教师,充分尊重教师专业自主,减轻教师的负担。在管理中赋予教师充分的专业自主权,减少那些“一刀切”式的行政命令和约束,以及各种事务性工作的干扰,让教师安

心、专心地研究教育教学的变革和创新。同时,校长要营造“拥抱多样”的学校氛围,鼓励和支持教师的探索与改变,包容探索中的“失败”和“不一致”,面对变革的风险敢于担责,使教师能够静心研究,敢于突破,实现自身的变革与成长。

总之,“双减”工作是一个契机,不仅促使我们深刻反思学生过重负担背后深层次的教育问题,更促使我们回到教育的本质来思考我国义务教育未来的发展。让我们以“双减”为起点,从现在做起,进一步提升小学教育的育人水平,为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

作者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正泽学校校长

警惕“社恐”成正常社交拦路虎

夏鹏飞

近日,中青报面向全国大学生就“社恐”话题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0.22%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存在轻微“社恐”,6.90%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已有比较严重的“社恐”,0.64%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严重的“社恐”。

轻微“社恐”并无多大危害,至多不过让人社交时需要多花点心理建设罢了。当然,如果属于被确诊的严重社交恐惧症,则需要寻求专业治疗。在谈论“社恐”时,有必要辨明究竟属于何种类型,这样才不至于对“社恐”如临大敌或以为为意,进而做到对症下药。

“社恐”出现甚至大为流行,有其社会根源。相较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和集体生活的无处不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早地进入了陌生人社会,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其衍生的各种新应用也让个体生存生活变得更为便捷。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更加高效的社交渠道,但一个个电子屏幕却把大家都限定在狭小的方寸空间里,线上社交活跃,线下社交恐惧可能变得越严重。

个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也是“社恐”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个体意识不断觉醒,无形中使得很多人重视他者对自己的关注与反馈。在这种重视下,好的或坏的反饋都可能被自己无限放大,有被“示众”的错觉。正因如此,很多人才在社交面前望而却步,害怕自己在公开场合说错话、做错事,从而觉得尴尬与影响自己的形象。与其面对未知风险,不如退一步对社交敬而远之,这便成了很多“社恐”大学生的为人处世心态。

尽管轻微“社恐”无伤大雅,但还需警惕其成为正常人际交往的拦路虎。减少社交,封闭自我,似乎也就能相安无事,可作为进入社会前的最后一站,如果养成了对社交的恐惧习惯,那么在职场等领域显然无法顺利融入。而且,即便在大学生校园,适当的社交也同样意义重大,其对于大学生的“三观”养成起着塑造作用。

克服“社恐”,一方面要靠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年轻人提高自我认识,意识到被自己当作开玩笑挂在嘴边的“社恐”可能正在逐渐演变成真实的病症,并对自己的社交心态、社交能力构成负面影响,从而主动求变。例如,多从“键对键”转向“面对面”,让真切切的社交成就战胜对社交的未知恐惧。社交是个熟能生巧的过程,提前设置议题、做好准备,增强自信,减少在社交场合的心虚感,也有助于克服“社恐”。

另一方面要为学生不断摆脱“社恐”创造条件。例如,高校多组织集体活动,把学生从封闭的宿舍、狭小的电子屏幕中“请出来”,用社交力量驱散“社恐”阴云。同时,也可组织“社恐”成因、如何规避等相关知识讲座,让大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对于“社恐”较为严重的学生,还要协助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乃至医学治疗。(作者系媒体评论员)